

一道光，驰过浙东田野

陈荣力

美的环境氛围，看惯了大西北浑浑粗粗的倪教授自然赞不绝口。他的赞叹，也让我忆起了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倪梁村的场景。

当时我在上虞小越参加农村工作队，晚饭后和一位乡里的干部返回住地。灰暗的夜色中我们傍着杭甬铁路边的一条土路慢慢走。半道之中，一声雄犷汽笛从身后传来，那汽笛石破天惊，撕破夜的宁静，让人血液鼎沸。接着是一束灼眼的光柱，像一把利剑刺碎夜的灰暗。光柱照亮的不远处，浙东的田野里一个河流屋舍、绿树庭院的江南村落古朴安详，纤毫毕露。

“那就是出过明朝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倪梁村。”随行乡干部的介绍，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倪元璐。从此这个名字像那束灼眼的光柱一样，一直在我的记忆里熠熠闪亮。

二

倪振民教授对倪元璐史实的熟稔如同自己掌上的纹路。

倪元璐的出名，当然在于文章写得好，但古往今来，文人名士如过江之鲫，文章写得好的自不在少数。倪教授和我们都明白，文章只是倪元璐的表征，或是他学识才华的铺张；真正让其名垂青史的，是倪元璐大义凛然的风骨、爱憎分明的人格和肝胆忠义的操作。

倪元璐担任翰林院编修时，阉党专权，魏忠贤的器张到了被称为九千九百岁、到处造生祠的地步。倪元璐奉命到江西主持乡试，一片万马齐喑中，他以“腐儒乎不可尚矣”命题乡试考卷，影射魏忠贤窃持国柄、大搞个人崇拜。朋友和同僚都为倪元璐捏了一把汗，他则泰然处之。

“先祖的政治功绩，最典型的当数力陈销毁《三朝要典》，这不仅体现了他的大义凛然，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智慧。”倪教授的赞叹发自肺腑。

“由魏忠贤指使亲信炮制的《三朝要典》，于天启六年纂修，炮制完成后由礼部刊刻发行。此书围绕挺击、红丸、移宫三案，颠倒黑白，借刀杀人。《三朝要典》也被称为‘杀人之书’。”

“崇祯皇帝即位之后，否定《三朝要典》是

必须的，但崇祯亦顾忌有悖先帝的名声。所以当南京兵部主事别如纶提出《三朝要典》断案多与皇上圣意矛盾，可对《三朝要典》作‘删削’时，崇祯很不高兴。时隔一月，倪元璐再次提及此事，并且把‘删削’升格为‘销毁’，崇祯欣然同意了。”倪教授停息了片刻。

“崇祯之所以同意销毁《三朝要典》，并非不再顾忌先帝的御制序了，而是倪元璐提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理由——‘公议自存，私书当毁’。这就击中了《三朝要典》的要害：此书并非天下之公论，故非先帝本意，而是魏忠贤之私书。”

“先祖是高屋建瓴啊！这样的高屋建瓴既是他的胆略和智慧，也是他大义凛然、疾恶如仇的人格所决定的。”

崇祯十五年，面对清军南下、国运艰难的时势，已回浙东老家陪伴八十岁老母多年的倪元璐奋然出山，应召入京，出任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不负所望的倪元璐为此掀起了一场被誉为“三做”的财政改革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成效颇为显著。可惜积弱积贫的大明王朝已到了气数殆尽的边缘，倪元璐纵有最大的本事，也是大厦将倾，一木难支了。倪元璐施行财政改革运动不到十个月，也即是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的农民军就攻陷了紫禁城。

“我一直在想，倪元璐有这样的‘与世之作者殊矣’的风骨、人格和操守，与他出生和成长的这块浙东的土地该有很大的关系。我拜谒了先祖的故里，真切感知了这方土地的人文风情，这样的认知更清晰，也更强烈了。”倪教授说。

“是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方地域的人文和渊藪，终究成为这方地域的士子、黎民百姓的精神滋养和文化基因，或隐或显地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弥漫开去。”近年来从事地域乡贤文化研究的我，对此深有同感。

这种豪气干云的风骨胆略、忠义凛然的气节人格，几乎是浙东文人、士子和名臣的精神传统和生命印记。

三

“这也可说是浙东地域的人文精神。”倪教授显然也十分赞同我的观点。接着倪教授向

我们讲述了他新发现的史料——倪元璐的浙东救荒。

倪元璐返乡陪侍老母期间，正逢灾荒连年，浙东绍兴诸府连续几年无雨日在90天以上，鉴湖成为旱地，号称“鱼米之乡”的浙东十室九死，饿殍遍野。倪元璐一面亲自出面，联络山阴、会稽、上虞、嵊县等县乡绅和退居的官员刘宗周、祁彪佳、余煌等人共同商定赈救办法；一面积极与绍兴府及山阴县的地方官联络商讨，提出“宽征”税赋、设立募助等建议，得到了地方官的承诺。

在倪元璐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浙东的这场灾荒措施得力，救活了十几万人，灾情也迅速得以遏止。

“‘谁任千秋担，公推五父樽。无将忠义死，不与吃河豚。’此乃倪元璐在崇祯元年写的自勉诗。可以说‘千秋担’和‘忠义死’，就是他生命中的两座丰碑！”

与倪教授告别，走出那家农家乐时，天色已经黑透。我还沉浸在刚才的交流中意犹未尽，蓦地，远处的夜空中传来一声火车的汽笛震荡耳膜。这几年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我即使身处城郊，也再难看到杭甬线上的火车以及那束灼眼的光炬了，但那震荡耳膜的汽笛，依旧石破天惊。汽笛声渐渐消隐了，而我的思绪却像藤蔓一般攀爬开来。

如果说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杭甬铁路的开通，那有着石破天惊的汽笛的嘶吼、有着灼眼刺目的光柱照射的火车，让仿如画舫一般匍匐的浙东田野，率先驰入工业文明的话；那么自东汉以降，在浙东的田野上，那些鸣响着光辉人格的汽笛、闪烁着思想光柱的生命的火车、精神的火车，不仅早已有之，而且从未停歇过。譬如那个“不独为正人增华，尤为文人吐气”的浙东汉子倪元璐。

带着光柱的火车驰过浙东的田野，驰过历史，也必定驰向未来。



艺境



《野水荒村》 施明德 92岁作

苍茫云水间

潘江涛

提醒“补壁”，说到底是办公室工作没有做好，拐着弯儿批评呢。

大约一周之后，陈星高便送来了施老的巨幅山水画。也许是我这个办事员没有交代清楚，反正画作一试挂，大家便觉得“笔墨有点粗”，与会议室整体装修风格不太协调，只好退了回去。

然而，更让我意外的是，没过几天，施老的儿子施晨光打来一通电话，告知父亲又完成了一幅作品，让我直接来家中取拿。

闲聊是在施老的画室进行的。那一年，施老已是84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腰板笔挺，思维敏捷，说起话来，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二

施明德，字峻辉，1915年生于东阳县林甘村，1931年入浙江省立七中（即金一中），1947年考入国立英士大学艺术专修科，毕业后长期担任中学教职，一生除从教之外皆坚持中国画创作，是金华画坛灵魂级人物。

东阳与磐安原本一家，地相接人相亲。他说，经安文朱色岭，再翻过“龙腾尖”山梁就是林甘村，这是地理上的亲近；1950年2月，他在磐安中学教授美术和中国历史，妻子王云苏也是老师——先在安文小学，后到深泽小学，熟知安文的风土人情，这又是情感上的融入。

施老撤去画桌上的纸张笔墨，把打算送给磐安的那幅画平摊在桌面上，再打开画室里的所有灯光。他说，前一幅属大写意，粗头乱服，非内行不易理解，而这一幅相对工整，线条简洁，雅俗共赏……

这幅画以六尺宣纸对开，49×198厘米，画面叫《苍茫云水间》，没有四五天时间恐怕是

人与人交往，有的天天见面，话不投机，情若白开，隔夜皆忘；有的见过一面，通透坦诚，一见如故，一辈子亦难以释怀。

去年8月，施明德老先生仙逝，享年108岁，浙江乃至中国画坛痛失一位“寿高、艺高、德高”的蔼蔼长者。

花开花落，暑去暑来，每每想起施老当年赠画一事，感佩之情油然而生。

一

2001年10月，磐安县机关事务局把老旧的常委会议室进行重新装修。彼时，我担任磐安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还不到一年，有一天列席会议，听主持会议的领导说，会议室刚装好，墙壁还是白的，请办公室补补壁吧。

补壁不难，难的是要锦上添花。调任磐安县政府办之前，我一直在新闻宣传部门当差，向磐安文化艺术界开口索要几幅作品想来不难，但将它们挂在常委会议室又觉档次低了一些。而磐安之外的书画家我认识的又不多，即便认识，也不一定张嘴就能讨来。

曾在《金华日报》谋生的陈星高那时已调来磐安林业部门工作。有一天，他来办公室串门，听闻我的“苦恼”，不假思索地推荐了施明德老先生的山水画。

施老的大名如雷贯耳，其作品多为写意山水画，非常契合山水磐安之主题。只可惜，我与施老素无交往，怎么联系？即便有了联系，贸然索要，润笔费又是多少呢？

如此等等，都是困扰我的难题。星高让我别急，并告诉我说，他与施老的儿子施晨光是好朋友，帮忙说说兴许能成。

说实话，当时的心理压力不轻。因为领导

心香一瓣

浪花

竺 泉

朵朵浪花
牵手你我他
相拥一个家
相爱一幅画
聚起潮涌向天涯
携手星月共芳华
浪花 浪花
牵手你我他
心相融 情牵挂
踏浪高歌逛天下

踏浪追潮

来来来 来来来
牵起你我的手
唱起家乡的歌谣
跳起快乐的舞蹈
我们是时代的荣耀
来来来 来来来
我们追风
我们奔跑
向着英雄的跑道
掀起激情澎湃的浪潮
来来来 来来来
大海的浪 亚洲的潮
东方高歌 天地唱和
我们踏浪 我们追潮
向着精彩 向着骄傲奔跑

（为喜迎杭州亚运会而作）

诗路上的不遇

孙昌建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山山水水，我以为最有名最值得一说的，应该就是王子猷雪夜访戴。

故事不足百字，却流传了近1800年，全文如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我是在嵊州的剡溪边重读这故事的，看完之后内心有一种悻悻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王子猷还是有点傻傻的，这种傻傻，是有很多元素组成的，如下了大雪，又喝了酒，再是读了诗，然后想起了好朋友，这就越来越像一种行为艺术了。可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时常喝酒，偶遇大雪，那当然是偶之又偶的，但我们肯定是要微信中先问一句的——在不在家，出来喝一口？

或者是：我明天晚上到嵊州，宵夜约一下？

又或者是：后天找个水库，先钓鱼，再吃点农家菜？总而言之，现代人是先要打招呼，要有约在先的。

不过我很快发现王子猷也是现代人，他发现这样不打招呼找上门去，可能不太礼貌，所以他找了个“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借口就回去了。

同时，这个王先生也是个高级推手，他这么一推，让戴（安道）也千古流芳了：老戴是谁啊，这么牛啊，连王羲之的儿子都这么喜欢又敬重他，肯定是了不起的人物啊。

诗读来读去总是那么几首，但是谈资故事却很有意思啊。后来想想也是，之所以唐代大诗人走出了这么一条诗路，原因就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特别是谢灵运在这条诗路上留下的流风余韵，包括那些在今天看来特别傻傻的行为，在当年可都是名士之风啊。

以另一条钱塘江诗路为例，也是这个道理，那是因为有一个严子陵。后代文人便都要朝这个方向前来朝圣和拜谒，而所谓的传承也就是既靠诗文传播，又靠诗路行走。我等后辈，就算来打个酱油，白斩鸡要靠酱油，写诗也要靠酱油的。

由王子猷雪夜访戴，可以想到唐诗之路上的诸多传说故事，而这其中的“不遇”，则是唐诗中的一个经典元素，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贾岛是没找着，王子猷是兴尽而返不找了，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前者像是在恋爱，后者也是在恋爱，但他只要恋爱就可以了，他没有终极目标，或者说他的终极目标就是所谓的“兴”，或者还有那场雪，雪中行剡溪，诸如此类的。

走在诗路上，其本身就是要向古典诗人致敬，现在的诗人也特别喜欢写“不遇”，一时之风也。我自然不能免俗，在《江河万古流》这本诗集中，一共收了三首“不遇”，其中有两首是写在浙东唐诗之路上的，那分别是写于萧山的《在临浦，寻蔡东藩而不遇》，写于上虞的《白马湖畔寻夏公墓不遇》，还有一首就是写在瓊江山水诗路上的《南明山寻米芾而不遇》。

具体说来，写蔡东藩这一首是两次到临浦，都没有能去他的故居一看。白马湖畔夏丏尊的墓，的确是去了且近在咫尺，的确是没找到。丽水南明山寻米芾，那就完全是一种虚构，只是说在摩崖石刻上看到了米芾的字迹。

不遇比遇更能写出诗来，只是今天的“隐者”已经不多见了。完全像王子猷那样，我根本就做不到，只能把诸多的遗憾写在“不遇”中了，就像失恋要比热恋好写，因为失恋的经验要永远多于热恋。

还有一点就是，通过写“不遇”，可以把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等亲朋好友写进诗里，这也是今天诗人们的一种套路。我不遇的都已经是故人了，只不过我把故人是放在今天的语境中。《白马湖畔寻夏公墓不遇》这一首，我原诗的最后两句是：正如走晚晴山房和平屋/弘一笑问夏老：“今天你吃了吗？”

说到底，人的心中永远有一场不遇的，这跟气象部门所说的，百年不遇千年不遇，应该不是一回事情，但是人心中的台风和暴雨，就是诗的来源之一。